

明月清风我 东坡消夏歌

大诗兄

——宋元祐五年(1090年)夏秋之际,苏轼在杭州任职,与袁穀等友人游山玩水时,不时唱和,写下了这首诗:

点绛唇

闲倚胡床,庾公楼外峰千朵。与谁同坐?明月清风我。

别乘一来,有唱应须和。还知么,自从添个,风月平分破。

所谓“胡床”,顾名思义,是游牧民族的坐具,可以折叠、方便携带,形似后来的折叠椅、小马扎。魏晋南北朝民族交融交锋时期,胡床传入汉地并逐渐流行,因为坐起来的的确惬意。而在此之前,汉人习惯跪坐在席子或垫子上,这种姿势很端正,但也很“端着”,时间久了难免会疲倦。所谓“庾公楼”,则是一个典故,指东晋名臣庾亮曾召集僚属登楼夜谈,斜倚胡床,剧谈彻夜,自是风流。

有了“斜倚胡床”和“庾公楼”的铺垫,自然就引出了这首词的词眼:“与谁同坐? 明月清风我。”在这个或许燥热或许通透的夏夜,在这个或许寂寞孤单或许群贤毕至的夏夜,我的内心世界里,只有一——明月、清风、我。这是目空一切,是唯我独尊,是我物我两忘,是天人合一。

类似的境界,我们仿佛在其他地方也见过? 李白在《月下独酌》中写道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这是明月、清影、我。李白又曾在《夏日山中》写道: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

中。脱巾挂石壁,露顶洒松风。”李白的羽扇,东坡的胡床,“裸袒”与“斜倚”,这是夏日的极致潇洒。李白与东坡,两位顶级浪漫的蜀人,相隔数百年,举杯相邀,无上清凉。

更巧的是,对于明月清风,李白和苏轼似乎都有一种“执念”。李白在《襄阳歌》中说,“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”;苏轼则在《赤壁赋》中说,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”。最宝贵的东西,无价。

二

“明月清风我”,这是东坡消夏歌。在东坡词里,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无比清凉的消夏之歌:

洞仙歌

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,姓朱,忘其名,年九十余,自言: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官中。一夜大热,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,作一词。朱具能记之。今四十年,朱已死,人无如此词者。但记其首两句,暇日寻味,岂《洞仙歌令》乎?乃为足之。

冰肌玉骨,自清凉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开,一点明月窥人,人未寝,欹枕钗横鬓乱。

起来携素手,庭户无声,时见疏星渡河汉。试问夜如何,夜已三更,金波淡,玉绳低转。但屈指、西风几时来,又不道、流年暗中偷换。

大苏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。在这里,他就先讲了一个故事:我小的时候,听

夜光杯

中国馒头(包子)胜过西方面包(夹心面包),在于健康。蒸煮之法比烘烤之法更友好于人类,已被实践证明。那么,由烘烤而蒸煮,再由蒸煮而烘烤,其过程到底是螺旋形上升还是后退,抑或仅仅服从于口味召唤?无从谈起。从字面上看,“烤包子”,似乎经历了烘烤—蒸煮—烘烤的循环。我们能够掌握的历史文献,对“烤包子”的描述,几乎是空缺的。

汉族餐饮语言系统里,无论馒头还是包子,其制作均归隔水蒸法。旧时的文学作品中,生活在艰难环境里的人们,会拿馒头或包子在篝火中烤着吃。那样的画面,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现在,也有人把蒸熟的馒头、包子放到炉膛里去烤,美其名曰“烤馒头”“烤包子”。可以说,它只是一种二次加工的产品,跟我们认同的新疆“烤包子”,是两个概念两码事,自然也是不同品种。

江湖传言,齐白石自夸,汉字中的“烤”,是他的发明。此事倒不是瞎掰,有照为证——老人确实在所题的“清真烤肉宛”五个大字边上,写过一行小注:“诸书无烤字,应人所请,自我作古。”偏偏有好事者不买账,他们从《醒世姻缘传》《红楼梦》(较晚的版本)、《帝京岁时纪胜》

等书中活活拈出了“烤”字,证实齐白石之前,“烤”字早已存在。

不过,种种考证,从另一个角度说明:“烤包子”的名目,在清朝以前的汉族食品里基本没有;即使有,也因稀见而不为坊间著录。

在维吾尔族语言里,“烤包子”被写做 samsa,音译“萨木萨”,其真实含义,我不得而知,恐怕与汉语里的“烤包子”无法严丝合缝地对应。有一说,认为它指一种“三角烤饼”,我以为比较贴近原意——无论从形状特征还是制作方法来说,新疆“烤包子”离烧饼近、离包子远。我猜想,“烤包子”只是汉族人对流行于新疆地区一种美食的毛糙说法,新疆少数民族同胞肯定有与之不同的名称和定义,此处不赘。

“烤包子”的基本做法:和面(用冷水;或一半面粉用冷水、另一半面粉用热水);汤面(把和好的面静置一段时间);搓条;摘剂;擀薄;放入由羊肉丁、洋葱丁、羊尾油丁及各色调料组成的馅子;四边折合成方形;表面刷一层蛋液,撒点芝麻;在馕坑或烤

箱里烘烤若干时间即成。显然,它跟馒头、包子的制作过程,区别极大。

你完全可以想象羊肉丁、洋葱丁、羊尾油丁和孜然等香料互相掺杂,以及它们与死面结合,被烤得微焦时散发的气味,是多么地馋人!

我多次去新疆,感觉卖“烤包子”的地方其实并不多,说“随处可见”更是夸张。此状有点辜负仅次于饅饼的新疆名点之称号。在上海,门口摆着烤羊肉串或烤饅炉子的新疆馆子倒不罕见,罕见的是兼卖“烤包子”的新疆太远。我网购过“烤包子”,但咀嚼实在费劲——里面净是一片片老而弥坚的羊肉,羊尾油放得也欠丰满,总之不咋样。

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讲过一个笑话:有个穷书生想吃馒头,便在馒头铺前突然倒下。店主大惊:“你这是怎么回事?”书生答:“被馒头吓的!”店主说:“天下哪有这种事嘛!”于是把书生带进一间放着一百多只馒头的屋子后,自己“穴壁窥之”,想一探穷书生究竟会被吓成什么样儿。只见穷书生仿若“老鼠钻进米缸”,大开“杀戒”,一下子“扫平”了五十多只……

面对上好的“烤包子”,我虽不会像穷书生那样煞费心机去“讹吃”,但,三下子“扫平”五十多只,可能性不小!



夏日(油画) 朱丹

山,山,还是山。

飞机自海口落地宜宾,短暂停留后,再次起飞,前往达州。天气出奇地好,白云自然缭绕,通透处下方的山川河流却也清晰可见。虽不是什么崇山峻岭,但连绵不绝,起伏起伏的丘陵地貌,夹杂着玉带般的碧色河流,煞是好看。

然而对山的深刻理解,在后来到达通江县后,颠簸于大巴山之间,才算真正领略感受。通江坐落巴山深处,《通江县革命老区发展史》中对通江的介绍是“位于川陕边界,山高坡陡,沟壑纵横,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”。从地质学上讲,通江“三山夹两谷”的地形,在地

“夏车长”的雅号,很有意思。

那年,汶川发生了8级地震,老夏是浦东一家市政工程公司的干部,当他接到支援都江堰的命令时,还没下班,也顾不上回家,打个电话给妻子后,就连夜带了15辆工程车,装着各类抢修设备、物资、器材等,驱车直奔四川都江堰。这15辆工程车来自公司基层几个单位,司机、技术人员、工人等互相不认识。为了协调、统一指挥,老夏毛遂自荐,担任起联络车队的“车长”。

车队刚进灾区,就下起了大暴雨,路基被冲垮了。突然,前面传来阵阵喧闹声,原来最前面的一辆车陷入了泥坑。这把夏车长急得双脚跳,时间就是生命。查看情况后,老夏把雨衣和外套利落地一脱,填在凹处车轮下。同伴见状也纷纷脱下外套,填在陷入泥坑的车轮下。夏车长指挥众人推车,终于解围。

夏车长

周成树

从都江堰凯旋后,“夏车长”就被叫开了。

老夏退休后,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旅游文化班。于是,“夏车长”又有了新任务。旅游文化班有实践课,时常外出活动。老夏热心肠,被大家一致推荐为旅游车的车长,夏车长也不亦乐乎。

一次,旅游班去千岛湖活动。回酒店休息时,坐在前排的张姨尖叫:“我项链上的鸡心吊坠没了。”这是张姨50岁生日时,丈夫送的礼物。夏车长得知后,一边安慰她,一边发动同学们寻找。但没有结果。第二天吃早餐时,夏车长竟有了意外发现。他冲到一个女同学前惊呼:“鸡心吊坠在这里呀……”原来,吊坠钩在张姨同伴那顶时髦的羊毛帽子上。后来,有人风趣地说,夏车长也是“福尔摩斯”。

夏车长有乐观向上的心态,他是平凡的人,因为努力而更加优秀。

七夕会

才能得到赐茶。与贡茶相关联的,则是茶叶专卖制度。由于宋太宗北伐辽国失利,国库空虚,遂加重了对茶农的盘剥,四川的茶农被迫揭竿而起,虽然失败了,但这段“茶叶革命”,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流传下来。

革命老区因茶叶而再获新生。在火天岗,看着年轻人在抖音直播中卖力地营销通江的茶,我知道,革命老区正通过科技与媒介,通过茶叶,努力拥抱新时代。现代化的进程让老区的“蜀道”不再那么难,农民变工人,农民变主播,偏居一隅的老区,也可通过市场化和媒介与世界建立新的通联。茶叶,也将为乡村带来新颜。

火天岗村的一处山岗,视野顿时开阔起来。火天岗,秦巴茶山第一岗,海拔约1400米,举目望去,是漫山遍野如梯田般的茶海。

通江的茶,在历史上闻名遐迩,最早可追溯至宋代,当时就是四川四名茶。火天岗的“天岗银芽”“天岗云雾”,1995年就曾获第二届中国农博会名茶评比金奖,在“蜀土茶圣”的四川也毫不逊色,此外,通江还有十多种历史名茶和创新名茶。

茶叶与革命的关系可追溯到唐朝。茶叶在唐朝就是国家重要的专控物资,北宋时逐步建立起严格的贡茶制度。据说,只在非常重要的节日,且只有地位尊贵的大臣

山,山,还是山。

飞机自海口落地宜宾,短暂停留后,再次起飞,前往达州。天气出奇地好,白云自然缭绕,通透处下方的山川河流却也清晰可见。虽不是什么崇山峻岭,但连绵不绝,起伏起伏的丘陵地貌,夹杂着玉带般的碧色河流,煞是好看。

然而对山的深刻理解,在后来到达通江县后,颠簸于大巴山之间,才算真正领略感受。通江坐落巴山深处,《通江县革命老区发展史》中对通江的介绍是“位于川陕边界,山高坡陡,沟壑纵横,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”。从地质学上讲,通江“三山夹两谷”的地形,在地

在泰日老宅的旧物里,我遇见了一本特殊的月份牌。

患阿尔茨海默病、在医院躺了三年的岳父,没有熬过这个特别寒冷的冬季。初丧里,女儿说:“外公生前喜欢练字,我们找找他的手迹吧,空了看看,留点念想。”于是,我和妻子在他的书房里到处翻找,却没找到。妻子说:“找不到是对的,阿爸一生节俭,平时练毛笔字,都是写在旧报纸上的,肯定是被当成废品处理掉了。”

岳父过世60天,老宅来了许多祭奠的亲眷朋友。妻子和她姐忙着接待客人,我在厨房打下手。去灶头间里寻找碗碟时,在砖灶后面的柴堆上,我看见一本8开大小的2010年的月份牌,已撕掉几页,是往灶膛里烧柴时引火用的。它们的背面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,蓝黑颜色的,是岳父的笔迹。一篇长文,是毛泽东的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,临摹的是黎汝相的钢笔行书;另一篇短文,是一首歌词——《真的好想你》。

岳父是军人,转业后当过工商所所长、县畜牧局的基层书记。他一生勤俭、刻板,做人做事都有章有法,一板一眼。像他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老党员,偏偏写下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,是我始料未及的。这篇《真的好想你》,没有临摹,完全是他自己的风格。挣脱了章法的羁绊,一笔一画,都是他自己的主张和心声,像弹奏,像奔跑,也像宣泄。

这是一首周冰倩的成名曲。其中有一句“我在夜里呼唤黎明”,岳父误写成了“我在夜里呼唤你的名”。显然,他应该是听着录音默写的。岳父很少唱歌,那一刻,他在想谁? 妻子说:“他是想妈妈了。”看我仍一脸疑惑,她拿出那本月份牌,指了指那篇《真的好想你》补充道,“你看落款上的日期,2011年2月28日,这是奶奶过世的第七天。”

我似乎全明白了。妻子曾说:“阿爸是个不善表达的人。”我想,一个一辈子都装在章法和框架里的人,即使要表达,也是隐秘的,不张扬的,是“叶子底下脉脉的流水”,是一个人的“荷塘月色”。这样想着,我仿佛看见,2011年2月28日,那个春光明媚的午后,或者,是春寒料峭的夜晚。岳父把自己关在书房,眼前浮现出小时候发高烧,母亲撑着油布伞,背着昏昏沉沉的他,一步一步打滑的情景。或者,他参军时,母亲亲自为他别上大红花,笑着流泪的样子。又或者,母亲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点心,微笑着对他说,这是你最爱吃的芝麻汤团,快趁热吃了……当他无意间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,无意间听到周冰倩如泣如诉的声音:“真的好想你,我在夜里呼唤你的名,天上的星星哟,也了解我的心……”歌中的每一个字,都刺痛着他的心灵,却又温暖着他的思念。于是,他便从抽屉里拿出钢笔,心化于手,手化于笔,笔化于墨,墨化于纸。在那本月份牌的背面,写下了这首歌,写下了他对母亲的无尽思念。

有时,我拿出那本发黄的月份牌,翻到那首岳父亲笔写下歌词的地方,当岳父隽永、洒脱的钢笔字又一次映入我的眼帘,冥冥之中,我听到了那份思念,它们在无声地歌唱。

有一天傍晚,我跑步回来,听到里屋传出一首熟悉的歌曲:“千山万水,怎么能隔阻,我对你的爱,月亮下面,轻轻地飘着,我的一片情……”循声进屋,我看见妻子倚着转椅,正看着那本月份牌上的钢笔字,默默流泪。她的手机正播放那首《真的好想你》。

无声的歌唱

李新章

